

馮承柏文集

(下)



范曾題



馮承柏 著



南开大学出版社

馮承柏 著

馮承柏文集
(下)



范曾題



南開大學出版社

目 录

(下册)

高等教育

人才流动说明了什么——冯承柏教授谈人才流动之一	475
中国人才外流原因何在——冯承柏教授谈人才流动之二	478
怎样防止中国人才外流——冯承柏教授谈人才流动之三	481
机遇、挑战与高级人才国际流动	484
略述解放战争期间平津知识分子的抉择	502
高级人才流动理论问题的探讨	510
略论我国教会大学的办学特点及办学效益	516
天津市高等学校九五实验室投资规划 98 年度及中期检查的 总结汇报	528
天津高等院校数字化图书馆“十五”投资工作总结报告	551

文化遗产信息学 (博物馆与图书馆)

漫谈西文工具书的阅读	569
博物馆与西方社会	584
美国的历史从这里开始——詹姆斯敦和威廉斯堡露天博物馆	593
西半球最壮丽的艺术殿堂——记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	599
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记美国国家宇航博物馆	605
略论西方博物馆的社会功能和社会效益	610
推荐一本马克思主义的博物馆学专著——《博物馆学基础》	625
论博物馆的起源	628
战后至 80 年代初世界博物馆的发展	634

国际博物馆学界关于博物馆功能的讨论	643
外国博物馆学理论及历史的札记	646
关于藏书建设与资源共享的一些思考	659
加强两岸交流、繁荣图书馆事业	667
加强学科文献信息保障体系	671
史学人才培养与文献信息网络建设	678
The Search for Modernity—Dynamics of National Museum of	
History in P. R. China	684
对卓越和公平的追求——20 世纪美国博物馆发展的回顾	696
天津市高等院校的远程教育与数字化图书馆	731
中美大学图书馆比较研究	742
有关信息素质教育的一些资料和几点建议	795
博物馆信息学札记	811
高校图书馆的电子信息资源整合与服务——兼谈天津市高校	
图书馆的数字化建设	823
图书馆联盟模式研究	831
略论元数据在建设数字化博物馆中的作用	849
美国高校图书馆的信息共享空间建设	860

西方文化史及其他

宗教改革的一面镜子:兰克的《教皇史》	871
略论“西方文化史”中的几个问题	875
从物质文化的变迁看中国社会国际化的历史趋势(1840-1990)	887
从张伯苓先生的一封信说起	911
在昆明跑警报——抗日战争期间南开人生活片段	914
冯文潜收藏的一张珍贵明信片	917
治学严谨, 诲人不倦——忆陈荫枋先生	920
我的十次美国之行(1981-2004)	922
电视剧《张伯苓》观后	928

附录

冯承柏自编年谱	933
冯承柏论著、译作目录 (1965-2006)	965
后记	974

人才流动说明了什么

——冯承柏教授谈人才流动之一

香港《大公报》记者 方凌

高级人才的国际流动问题，早在二十多年前就已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密切关注。这种人才的流动与流失，是中国大陆和台湾、以及香港和澳门所一直面临的问题，特别是在中国大陆，它已显得十分突出而不容忽视。

人才流动说明了什么？怎样防止人才外流？又怎样为滞留国外的高级人才的回归创造条件？记者带着这些问号，访问了不久前出席“环太平洋高级人才流动学术讨论会”从洛杉矶归来的天津南开大学副教务长、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副主任、社会学系代理主任冯承柏教授。

在这个有来自海峡两岸的中国学者和美国、菲律宾、新加坡、南朝鲜等国家和地区专家出席的讨论会上，冯承柏用社会学的观点，对国际和中国的高级人才流动问题作了科学的具体分析，引起了与会学者的重视。

人才流动是不可避免的

冯承柏首先认为，高级人才的国际流动，是劳动力国际流动的一部分，也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形成后出现的一种自然现象。只要存在资本、商品和科技文化的国际流动，劳动力的国际流动就是不可避免的。因此，从宏观来说，中国的人才外流，也是高级人才国际流动的一部分。如果说某些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教育制度基本上可以衔接，但本国又缺乏吸引高级人才的社会经济和文化机制，不能充分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那么他们向发达国家流动则是必然的。

发达国家吸引人才流向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苏等发达国家的高科技急速发展，并

展开激烈竞争。其特点是：科技人员的劳动分工很细，科研条件优越，工资待遇高，从而成为发达国家吸引高级人才流向的主要因素。但它所遇到的一个突出问题，则是由于人才培养受到市场经济的制约，而使教育与科技发展的需求脱节，基础研究人才短缺，甚至影响到国家实力的巩固。比如 1957 年世界第一颗人造卫星在苏联上天后，美国发现自己在科技竞赛中的差距，大感高科技人才不足。为了吸引人才，白宫不得不改变其移民政策，取消对亚洲移民的歧视政策，实行亚欧移民平等对待的原则，并优先对高科技人才开放。于是亚洲移民大量进入美国，其中科技人员在 1971 年以后占一半以上。

发展中国家人才为何外流

发展中国家在战后意识到，要步向先进，必须发展经济，而发展经济则必须依靠科技。科技人才的培训，则有赖于发展教育。菲律宾、印度和南朝鲜，在教育制度上同西方国家颇为相似，但人才的培训却超过了本国经济发展的速度，以致出现了高级人才过剩的畸形。因此，这些国家的人才向美国流动就很自然。

与此同时，随着国际间政治、经济联系的加强，交通、通讯工具的发达，国际学术交流的频繁、活跃，跨国公司的日益发展，以及这些跨国企业对人才的聘用，从而形成了国际高级人才市场，更加促进了人才的流动。

从个人因素来看，政治体系、社会结构、经济水平和文化背景所引起的意识形态上的变化，出现了一种“民族主义淡化、个人才能至上”的倾向，为了谋求个人才能的充分发挥，不惜背井离乡，甚至放弃原有国籍和本民族的传统文化。

美国高级人才接近饱和

但是，就目前情况来看，美国对高级人才的需求已接近饱和。战后的美国经济一直处于上升的优势，1973 年以前是高速发展，在此期间，亚太地区有大量人才涌进美国。但是不久，石油危机沉重地打击了美国经济，迫使它从高速发展走向衰退，直到 1982 年才又开始回升。但其发展速度已经放慢，从而出现了人才相对饱和的状态。

美国高级人才日趋饱和的形势，促使当局又停止执行移民中的“第三项优先”，并出现了新的种族歧视行为。特别是加州地区，竟限

制亚裔入学比例，在亚裔学生占四分之一的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种族主义抬头，甚至出现了“亚洲人滚回老家去”等排亚口号。

美国大门并非无条件敞开

这一事实说明，美国的大门并不是无条件地永远敞开的，更不是无选择地对来者不拒的。高级人才的过分集中，尖锐的竞争和专业比例与需求量的失调，有可能形成新的人才浪费和学非所用以至失业。因此，在美国出现博士开“的士”的现象，并不足奇。但是这对于有意越洋谋迁升和滞留国外不归的人来说，难道一点也不值得深思吗？

载《大公报》1988年12月7日

中国人才外流原因何在

——冯承柏教授谈人才流动之二

香港《大公报》记者 方凌

美国高级人才既已出现饱和趋势，为什么中国大陆不少研究生和学者仍滞留美国不愿意回来？而且大陆的“留美热”也并未因此降温？

大环境和小环境的影响

冯承柏教授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先以南朝鲜和台湾为例作了一个比较。他说，南朝鲜的经济起飞始于 60 年代，经过二十年努力，到 80 年代成效显著。而在此以前，其高级人才的培训也有超越经济发展的现象，约有五千余高级人才滞留美国不想回去；但到 80 年代，南朝鲜的经济已发展到可以容纳这些高级人才的水平，于是他们纷纷回归施展才华。

台湾的情况与南朝鲜极为相似。在 50 年代，台湾赴美留学生百分之九十五都不回去；而从 1986 年开始，随着台湾的经济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留学生回归比例从过去的百分之五增加到百分之二十五。

这些情况表明，在大环境上，政府的政策和经济发展，都能左右人才的流动，在小环境上，也要看所去的部门单位是否有吸引人才的条件，第三才是个人的因素——个人的民族责任感。

“文革”投下阴影太深

那么中国高级人才外流的问题到底在哪儿呢？

冯承柏说，“文革”的十年浩劫，使中国的教育和广大知识分子受到严重摧残，到 1972 年，全国大专院校由“文革”前的四百三十四所减少到三百三十八所，在校大学生由六十七万骤降到四万七千人，再加上长期的闭关锁国，使中国的科技大大落后于世界先进水平。

打倒“四人帮”后，大陆百废待兴而人才奇缺。1978 年底，中央

在大力恢复高等教育的同时，大批派人出国留学，到今年六月，赴美留学生和访问学者共达六万一千人，已经学成归国的共两万二千人。

另据美国移民局公布的统计，1979至1987年，大陆公派留美人员为三万九千六百九十八人，其中有二百六十五人已在美国定居，自费生两万二千三百零九人中，则有五千九百七十三人已在美国取得“绿卡”。

最令人担忧的是，1983年以来派出的近四千名留美研究生，应在1989年和1990年陆续学成回国。但在他们当中到底能有多少人回来？现在还是个未知数。看来大环境和小环境，仍是重要的影响因素，“文革”投下的阴影太深了！

他们在海外观望什么

据国家教委透露，今年已到期应回国的留美高级人才有两三千人，但至少有一半尚未明确表态，仍在观望中。

他们在观望什么？据冯承柏所接触到的情况来看，主要是国家的大环境、知识分子在国内的地位、人际关系、工作条件和物质生活条件。冯承柏列举台湾一位学者在60年代对三百七十二名留居美国的台湾高级人才的调查情况，对大陆很有参考价值。他们留在美国的原因依次如下：一、较好的待遇；二、较理想的生活方式；三、在美居住年限；四、台湾欠缺公平竞争；五、美国有较稳定、较民主的政治气氛；六、在台湾无亲友。

另一位台湾学者在1984年对五百名留美高级人才的调查中发现，他们对“人际关系”因素的满意度较高，而对“迁升方面”的满意度偏低。他们对台湾大环境的看法是：“公共部门服务人员态度欠佳，敬业精神有待加强，公职人员之特权、贪污等恶习尚未有效清除，行政机构之效率有待进一步改善，官僚气息存在，各部门之本位主义过分浓厚，行政方面缺乏魄力，行政和研究机构研究风气不佳，行事不够踏实，说多做少，冗员太多，未能彻底实行退休遣送办法，对主管人之安排过分重视慰劳之意”，等等。

冯承柏说，这些弊端，在大陆也有不同程度的存在，同样是导致人才外流和影响高级人才回归的障碍，这也正是目前滞留海外的留学人员注目观望之点。

国内现状难尽人意

根据冯承柏对大陆留美研究生和访问学者的了解，他认为从大环境来看，使他们持观望态度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一是派出人员的专业结构有问题，纯理科（科技理论）的比例太大。国内搞科技理论的研究生只占全体研究生的百分之二十三点六，而派往国外的纯理科留学生竟占全体外派人员的百分之五十一。因而使他们不得不怀疑在国外所学到的科技知识，在国内到底有多么大的适用性。

二是国内科技管理制度还不健全，比较普遍的问题是“论资排辈”。只有年高望重者才能拿到科技基金和获得较好的科研条件，并受到重视；年轻人则望尘莫及，不知要等到何时才能出头，而这种状况短期内尚难彻底改变。

三是缺乏一个使知识分子能够专心致志地从事科研和教学的环境，“双百方针”未能真正得到贯彻，学术自由缺乏充分保证；再加上“体脑倒挂”，教育经费不足，通货膨胀，知识分子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待遇尚未得到切实的显著改善，以及贪污腐化、时弊丛生，使人颇为困惑。

从单位来说，复杂的人际关系和较差的科研环境，使他们无法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有的学者说，他“在国外一天的工作效率，至少可顶上国内一个月”。

冯承柏说，这些问题不解决，在防止高级人才的流动和流失上，就很难取得显著成效。

载《大公报》1988年12月8日

怎样防止中国人才外流

——冯承柏教授谈人才流动之三

香港《大公报》记者 方凌

中国面对高级人才的流动和流失等问题，应该采取怎样的措施来进行补救和整治？

关键在于国家的政策

冯承柏在回答这个问题时肯定地说：“关键在于国家的政策。正如英国著名经济学家狄米特里·N·乔拉法斯在他的名著《知识革命和国际人才市场分析》一书中所指出的那样，应该采取积极为知识革命创造良好条件的政策，而不应该采取消极的限制性政策。”冯承柏认为，“这种积极的政策，只有在大环境有了显著改善、特别是政治局面长期稳定的情况下才能诞生和切实生效。”

可供参考的“基本方针”

冯承柏还以乔拉法斯提出的发展中国家控制人才外流的“基本方针”为例：一、控制人口增长，提高人的素质；二、努力改善人民的生活条件和环境；三、发展教育事业，使课程设置和实验室现代化；四、实行年老退休制，保证政府工作人员年轻化，以提高文员素质；五、制订切实可行的奖励制度，强调效率和工作表现，而不是取决于资历和家庭背景；六、设计出一套合理的工资制度，使具有专业知识而又确有贡献的人能得到相应的较高待遇；七、创造一个稳定的政治环境，以鼓励外商投资，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促进各种信息和现代科技的交流；八、将国民经济的百分之三用于科研，其中大部分应用于长远的研究计划。

限制政策不是治本方法

冯承柏说，这虽是乔拉法斯在 60 年代为发展中国家设计的“基本

方针”，但对中国解决面临的问题，仍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在谈到一些限制性措施时，冯承柏说，现在规定大学毕业生和研究生完成学业后，必须先在国内工作一定时间方可出国留学；在职高级人才出国需经主管部门同意，并履行一系列审批手续；还有的对不按期回国和不回国的人，采取经济和行政上的制裁，等等。他认为，根据中国的具体情况，有些限制是必要的。但也有些是不可取的。比如有的单位对要求自费出国留学的人，首先让他辞职，这种做法实际上无异于迫人出国不归。虽属个别现象，但影响极坏。他说：“适当的限制虽是必要的，但它绝不是治本之法。”

应该允许来去自由

“重要的是要使我们的政策既要切合实际，又要比较灵活。”冯承柏说，如果这种政策不能恰当地体现高级人才的价值，仍是“搞原子弹的不如卖茶鸡蛋的”或“能开颅的医生不如剃头的师傅”，那就很自然地会促使人才要作去留的选择。

冯承柏说，政策的灵活性还应体现在来去自由上。他认为，来去自由可以加速人才流动，并通过这种流动来取得信息和资料，以用于新科技的开发和促进经济建设的发展。

在谈到合理政策的制订时，冯承柏说，有关部门的领导人应首先从理论上研究形成高级人才流动的原因和利弊，了解当前高级人才的心态和滞留国外的各种不同情况。他说：“美国研究中国留学生已出了三本专著，加拿大也已出了两本，而我们却对此缺乏深入的研究。教育行政部门对此感到力不从心，甚至连一些基本材料都极不完善。”冯承柏说：“不能只靠找几个校长来谈谈，或开几个座谈会，拍拍脑门儿就凭老经验来制定政策。我们的政策应该建立在切合实际的科学基础上。”

目前在人才外流上虽然问题不少，但冯承柏对人才的回归仍持乐观态度。他说：“解放前和解放初期，中国各方面和条件都不如现在。但贫穷和落后并未能阻挡海外游子的报国心，一股强烈的民族责任感促使他们冲破各种障碍回归祖国。原子弹、氢弹‘两弹上天’这样的尖端技术，正是50年代从美国归来的老一代高级科技专家搞上去的。”

要为人回归创造条件

冯承柏在谈到自己于五年前从美国进修归来的体会时说：“美国条件好，那是美国人民经过二百年的努力创造出来的。我们应该回来为自己创造条件，而不应该依赖别人为我们提供优越条件；回来的人越多，改变现状就力量越大、越快、越有希望。”

改善大环境是重要催化剂

冯承柏的经历，可算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小小的缩影。1957年，他因同意一位著名教授的某个史学观点，并因给顶头上司提意见，受到残酷打击，被强送到一个以收容闲散人员和无业游民为主的农场去放牛牧羊，直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得到彻底平反。但是这些曲折坎坷并未能磨灭他对祖国的忠诚。在结束采访时，他对记者说：

“我深信我们炎黄子孙的民族意识和责任感，即使那些尚在观望中的海外学人，也总有一天会踏上归程的。”但是他又补充了一句：“当然，大环境的改善仍是重要的催化剂。”因此，人们把这个迫切问题的解决，寄希望于全面深化改革的进展，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载《大公报》1988年12月10日

机遇、挑战与高级人才国际流动

近 20 年来,世界经济发生了很大变化,日本的崛起,西德的奋进,美国经济势力的相对下降,使世界经济呈多极化发展趋势。苏东政治、军事形势的巨大变动,从一定意义上讲,将削弱国际政治、军事竞争,并赋予国际间的经济竞争以新的内容,其重要性可能将超过政治、军事而成为国际问题的中心。在这场世界形势的变迁中,中国采取的方针和策略将决定今后中国的命运。

一 改革开放与机遇挑战

1978 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对外经济关系发生了具有深远意义的战略转变,改革开放已成为中国的基本国策,改变了中国内向型经济模式,解除了由于片面理解自力更生而对中国经济造成的束缚,使中国经济适应了国际经济发展的总趋势,为中国经济腾飞奠定了基础。

从亚太地区来看,新的科技革命促进美国、日本的产业向更高层次过渡。日本经济发展模式的成功为亚太一些国家和地区树立了仿效的榜样,于是各国纷纷采取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以上两个条件的综合作用导致亚太地区国际分工格局的演变,使劳动密集型产业发生了两次大的转移。60 年代中期正当中国大陆“文化大革命”轰轰烈烈之时,美、日等发达国家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南朝鲜、新加坡、中国的香港和台湾,70 年代以上四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脱颖而出,被誉为亚洲“四小龙”,中国失去了第一次机遇。70 年代末期亚太国际分工格局又发生了第二次演变,美、日开始向高科技产业进军,“四小龙”开始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结构转变,劳动密集型产业由“四小龙”向其他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转移,其中包括东盟四国和中国。此后,亚太经济格局表现出了明显的梯次结构。美、日等发达的工业化

国家,处于最高层,亚洲“四小龙”处于中间,第三个梯次包括亚太地区发展中国家。处于梯次顶端的美、日的经济发展带动了其余两个层次的经济的发展,而其余两个层次的追赶式经济发展又促使美、日向更高产业结构过渡。这种带动与追赶式亚太经济发展格局使亚太地区经济在 80 年代成为世界上经济发展最快的地区。

中国的改革开放,及时抓住了时机,在发展进口替代的基础上,很快转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可以说,目前是在努力开发本身的科技、资源、市场优势基础上,积极引进技术,发展以出口导向型为主、并与进口替代相结合的中国模式。这一模式既不同于香港的直接发展出口主导型经济,也不同于亚洲“四小龙”中其他“三小”,从进口替代型而逐步过渡到出口导向型,适合中国国情的战略方针,促进了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据亚洲开发银行的报道,70 年代中国经济发展平均为 6.5%,低于亚洲“四小龙”的 9.2%,也低于东盟四国的 7.4%,但 80 年代,中国经济发展速度既高出“四小龙”,更高出东盟。¹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国民生产总值和国民收入指标变动如下表:

表 1 1978 年以来的中国国民生产总值和国民收入

单位:亿元人民币

年份	国民生产总值(当年价格)	零售物价总指数 1978=100	国民生产总值(固定价格) 1978=100	实际 GNP 增长率%	国民收入(当年价格)	国民收入(固定价格)	国民收入变动 %
1978	3588	100.0	3588	—	3010	3010	—
1979	3998	102.0	3920	9.25	3350	3284	9.10
1980	4470	108.1	4135	5.48	3688	3412	3.90
1981	4773	110.7	4312	4.28	3941	3560	4.34
1982	5193	112.8	4603	6.75	4258	3775	6.04
1983	5809	114.5	5073	10.21	4736	4136	9.56
1984	6962	117.7	5915	19.60	5652	4802	16.10
1985	8568	123.1	6689	13.09	7040	5496	14.45
1986	9726	135.8	7162	7.07	7899	5817	5.84
1987	11351	145.7	7791	8.78	9361	6425	10.45
1988	14015	172.6	8120	4.22	11770	6819	6.13
1989	15677	203.3	7711	-5.03	13000	6394	-3.23

资料来源:依据《中国统计年鉴》1989 年;《1989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光明日报》1990 年 2 月 21 日统计数据汇编。固定价格计算的国民生产总值和国民收入按当年价格的该两项指标除以零售物价总指数而得。

1 亚洲开发银行《亚洲发展报告》1988 年。

中国改革开放经济政策的实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1978 年到 1988 年 10 年间，年平均国民生产总值实际增长速度达 8.5%，人民生活水平得到迅速提高。但 1989 年的紧缩调整，使国民生产总值实际增长出现负值，国民收入下降。

改革开放使中国的对外贸易有了长足进展，国际贸易地位不断提高。1978 年，中国产品出口居世界第 28 位，进口第 24 位，进出口总额居第 24 位。1989 年出口上升到第 13 位，进口第 12 位，进出口总额居第 13 位。

表 2 1978 年以来对外贸易统计

单位：百万美元

年份	进出口 总额	进口额	出口额	贸易平衡	年份	进出口 总额	进口额	出口额	贸易平衡
1978	20660	10915	9745	-1170	1984	50777	25953	24824	-1129
1979	29332	15675	13657	-2018	1985	69809	42480	27329	-15151
1980	37644	19505	18139	-1366	1986	74614	43247	31367	-11880
1981	43107	21631	21476	-155	1987	82687	43222	39465	-3757
1982	40785	18920	21865	2945	1988	103015	55352	47663	-7689
1983	43409	21313	22096	783	1989	110067	58316	51751	-6565

资料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贸易方向统计》1984、1990 年鉴。

1953 年到 1978 年间，我国商品进出口从 23.7 亿美元增至 206.4 亿美元，年平均增长 8.7%。1978 年到 1989 年增幅猛升到 16.4%，其中出口为 16.39%，进口为 16.45%，进出口几乎是同步增长。同亚洲其他国家和地区相比，我国大陆对外贸易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不大，1989 年外贸进口额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 11.6%，同期香港的这一比例达到 116.6%，新加坡 162.6%，中国台湾 43.0%，南朝鲜 30.4%，马来西亚 18.9%，泰国 30.7%。1988 年中国外贸出口额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 12.7%，同期的香港为 115.6%，新加坡 150.8%，中国台湾 52.0%，南朝鲜 33.8%，泰国 27.6%，马来西亚 59.9%，印尼 25.1%。虽然中国的对外贸易并非国民经济的支柱，也不像其他国家和地区所占比重那样高，但中国的外贸却促进了整个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成套大型设备的进口，高科技的引进，合资企业的发展（这种形式的外